

蒙古史论文选集

第五辑

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

蒙古史论文选集

第五辑

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

一九八三·呼和浩特

目 录

试论西汉时期汉在西域统治的

- 确立和汉匈统一的形成……………朱葆珊 (1)
- 匈奴社会制度初探……………林 幹 (50)
- 论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的历史作用……………朱葆珊 (101)
- 试论匈奴与西域的关系……………白凤岐 (110)
- 试论匈奴史中的若干问题……………林 幹 (129)
- 突厥社会制度初探……………林 幹 (195)
- 突厥的习俗和宗教……………林 幹 (220)
- 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林 幹 (234)
- 辽金元时代内蒙古地区的
- 城市和城市经济……………贾洲杰 (265)
- 金代长城初议……………贾洲杰 (282)
- 关于研究古代的北方民族史和西北民族史
- 在方法论中的若干问题……………林 幹 (298)
- 中国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金启琮 (314)
- 唐努乌梁海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潘世宪 (363)
- 鄂博考……………潘世宪 (421)

试论西汉时期汉在西域统治 的确立和汉匈统一的形成

朱 葆 珊

(一)

在我国历史上的西汉时期，发生了两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1）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六〇年），汉在西域设立都护，正式确立了汉在西域的统治；（2）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五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汉匈统一的形成。这两起重大事件的产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然而在一般有关的历史著作中，对此不是语焉不详，失之简略，就是处理失当，夸大了西汉王朝的武功。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更易于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汉在西域统治的确立和汉匈统一的形成，主要是西汉王朝对外实行武力扩张的直接结果。这种看法，既与历史实际不合，也是极其片面的。为了使这一问题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本文拟就个人管见所及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为了行文方便，先从汉匈关系谈起。刍蕘之见，不免多有谬误，尚望读者指正。

(二)

匈奴民族原是我国北部地区众多的民族之一。秦、汉以前，它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大约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匈奴社会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形成了初期的奴隶制度。

秦末汉初，随着匈奴奴隶制的逐渐形成，以冒顿单于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对外掠夺财富和扩大统治范围，便以其强劲的兵力对毗邻各族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侵犯，猛烈地向外扩张：往东“大破灭东胡王”；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并进至汉地的“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往北征服了“浑廆、屈射、丁零、隔昆、龙薪黎之国”；在西边初则“击走月氏”，继则更西“求月氏击之”并控制了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①。经过了这一系列的猛烈扩张，匈奴贵族的统治势力终于席卷了整个蒙古草原和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建立了一个东起辽东、西迄葱岭、北至贝尔湖和南傍长城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匈奴贵族对被征服的各族实行着部落奴隶制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人民遭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奴役。

剥削阶级的贪欲好比无底的深渊，是永远也填不满的。以冒顿单于为首的匈奴贵族并不以其既得利益为满足，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还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初，便将其军

^① 《汉书·匈奴传》

锋南指，首先向汉发动了掠夺性的军事侵犯，围攻汉驻守代郡马邑的韩王信，并进至晋阳。此后不久，汉高祖率兵抗击匈奴，大败于平城，刘邦本人也几乎被俘。这时汉族地区由于秦汉之际长期统一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十分凋弊，财政空虚，人口锐减，以至“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①，公私交困，极为严重。当时西汉政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社会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因而在平城失败之后，为了暂时缓和外部冲突，汉于是以“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与匈奴“约为昆弟以和亲”^②，实行和亲政策，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犯行为并不因和亲而中止，在汉初数十年间，仍然几次大举南犯：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略人民”；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前锋直指雍、甘泉，威胁着刘汉王朝的心脏；其后又“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文帝后六年，“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又“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③。在汉不断与之和亲的情况下，匈奴仍然多次向汉进行侵犯掠夺的根本原因，正是匈奴内部“日益盛行的奴隶制”已经在贵族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牢固的观念，这就是把掠夺“邻人的财富”看成是“比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而作为“经常的职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以上均见《汉书·匈奴传》

业”来加以进行了，《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贵族大臣们所谓“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的事实，正是这种观点的最典型的反映。

正是由于在汉不断和亲的情况下，匈奴仍然多次向汉侵犯，所以汉王朝在实行和亲政策的同时，也不断地加强边防和在必要时进行抵御，刘邦在与匈奴和亲的同时，即造“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①十余万口于关中，以达到“强本弱末”和“无事可以备胡”的目的。文帝时，又“发卒以治塞”，“募民徙塞下”^②，加强边防力量。文帝前三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汉即发车骑八万三千相抗。文帝前十四年及后六年，匈奴两次大举入侵，汉都发兵相拒，将其逐出塞外。

毫无疑问，汉初数十年间，无论是与汉和亲或进行军事侵犯，都是匈奴贵族勒索和掠取汉地人民、财富的手段。但是，汉王朝实力逐渐充实，边防日臻巩固，特别是文帝时期匈奴贵族两度撕毁和亲之约对汉进行的大举入侵都因遭到汉的对抗而不得不退出塞外的情况，既说明了匈奴在军事上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也显示了汉王朝不可屈服的决心，这就势必使匈奴贵族在实践中认识到汉并非软弱可欺和通过和亲以取得汉物是比武力掠夺更为有利和可靠的途径。因而，在“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的情况下，终景帝之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③。到了武帝初期，随着历史条件的进一步转化，从武帝建元元年

① 《汉书·刘敬传》

② 《汉书·晁错传》

③ 见《汉书·匈奴传》

至元光二年汉谋马邑之前的七、八年间，在汉“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饒给之”^①的情况下，匈奴贵族停止了对汉的侵犯，主动要求和亲，终于在汉匈之间出现了“匈奴自单于目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②的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

应该认为，这种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是有利于汉匈两族人民的和平交往，符合汉匈两族人民的和平愿望的。但是，历史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局面不仅难以长期维持，而且由于历史条件的转化，汉匈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如上所述，景武之际匈奴贵族之所以“亲汉”，只是由于在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和亲取得汉物已比武力掠夺要来得更为可靠和有利的原故。因而，这种转化只能认为是在其本身利益不变的前提下的有条件的转化，而不是匈奴贵族掠夺本性的根本改变，所以，武力掠夺虽已不尽有利，但并不排除一旦出现了比和亲所得更加有利的机会或汉的策略发生变化损及其一贯利益时，匈奴贵族将会重新使用武力来达到其本身所固有的掠夺欲望的可能性，因为其所籍以对外掠夺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当时并没有丝毫削弱。武帝元光二年，汉设谋马邑以大利相引诱，并伴设内应故给匈奴以可乘之机的时侯，军臣单于即一改其主动要求和亲的面目“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准备大掠一番，而马邑之谋以后，匈奴即断然“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③的情况，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上述情况表明，导致战争的根源，这时在匈奴一方是并没有消除的。

①②③ 均见《汉书·匈奴传》

其次，从汉方面来看，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本身利益的决定和历史条件的成熟，汉匈战争的发生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汉初对匈奴的侵犯进行抗击的同时所实行的和亲政策，在客观上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西汉封建统治者的主观目的而言，却也不很简单。高帝平城失败之后，《汉书·刘敬传》记其事云：

“是时，冒顿单于兵疆，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目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目力为威，未可目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敬曰：

‘陛下诚能目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目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目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谕目礼节。冒顿在，因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可母战目渐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结和亲”。

由此可见，西汉封建统治者实行和亲政策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和深远的目的，这就是在无力“武服”匈奴的情况下，企图以婚姻关系为约束和物质文化的影响来缓和外部冲突，并逐渐使匈奴臣服。文帝时期，贾谊把“建三表，明五饵，盛资翁主”①的和亲主张，作为是“禽敌国”，“使匈奴之众为汉臣民”②的重要手段，就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

①② 见《新书·匈奴篇》

种观点，实际上是西汉封建统治者对付匈奴的总战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一策略在实践当中并没有达到西汉统治者所预期的目的。

匈奴贵族在汉不断与之和亲的情况下仍然连连侵汉，这自然是非正义的，但在具有“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①的大汉观点的西汉统治者看来，这却是“遇天子至不敬”^②和“屡欲亢礼，妨害帝义”^③的悖逆行为。因之，在文帝时期，贾谊就以继续和亲和岁给匈奴“金絮綵缯”是“入贡职于蛮夷”、“为戎人诸侯”^④的“卑辱”屈从而大声疾呼。他认为这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的不可容忍的“目悬之势”^⑤。“击与和亲孰便”^⑥的对策这时也开始成为西汉君臣之间讨论的课题。公元前一七七和一六五年，文帝还曾两次部署准备亲征匈奴，只是由于种种矛盾的牵制，未能成为事实。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文帝时期，随着汉内部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封建统治的日益巩固和国力的逐步充实，“武服”匈奴的思想已经在西汉统治者的决策当中开始露头。这种思想，到汉武帝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汉武帝是一位抱有“欲章先帝之洪业休德”^⑦和“因势

① 见《新书·匈奴篇》

② 《新书·势卑篇》

③ 《新书·匈奴篇》

④ 《新书·势卑篇》

⑤ 《新书·解悬篇》

⑥ 《汉书·匈奴传》

⑦ 《汉书·武帝本记》

变巨主四夷”^①的一世雄图的封建帝王。他从其前辈对匈奴的政策中吸取到的经验教训，是“朕饰子女吕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媼，侵盗无已”^②，是匈奴“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③；而时代又给了他相当有利的物质条件，因而他决心要“刷耻改行，复奉正义”^④，以改变“匈奴以虚名市于汉而实不从”的局面，并从而建立一个“日月所烛，莫不率俾，……海外肃沓，氏羌来服”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汉武帝在即位之初，即积极筹划对匈奴用兵：建元三年，得知西域的大月氏与匈奴有隙^⑤，汉武帝即派张骞“使月氏”，准备与其联合由东西夹击匈奴；建元六年，当“匈奴来请和亲”之后，汉武帝即欲乘机“举兵攻之”。西汉封建统治者“武服”匈奴的打算经文景时期的酝酿，到武帝初期已经完全成熟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由汉匈两族统治阶级的本身利益和对外政策所导致的汉匈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缓和的程度。因之，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军事冲突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发生的历史现象了。汉马邑之谋以及随之而来的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的相互对

① 《盐铁论·复古篇》

② 《汉书·武帝本记》

③ 《盐铁论·结合篇》

④ 《汉书·武帝本记》。按：“正义”一词之内容，语无明文，当与《新书·威不信》篇“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荷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之义同。

⑤ 《汉书·张骞传》：“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循而怒匈奴，无与共击之”。

抗，终于把酝酿已久的战争序幕揭开了。

(三)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洗刷西汉封建统治者所认为的“足反居上，首顾居下”的所谓“屈辱”，并从而使匈奴臣服，这除了在其最初的决策中有所反映以外，在战争的实践过程中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当匈奴累败，“漠南无王庭”，伊稚斜单于“遣使好辞请和亲”之时，武帝即提出了“使为外臣，朝请于边”的条件；元封元年，武帝又曾“勒兵十八万骑”亲出北边“目见武节”，并遣使郭吉风告乌维单于，促其“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其后，复遣使揭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吕太子为质于汉”^①等等。

汉武帝时期，与对匈奴用兵有密切联系的，是汉在西域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的和军事的活动。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事实来看，汉武帝通西域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服从于打击匈奴的总需要而对西域各国中个别不满匈奴的大国进行联络，以收东西夹击匈奴之功。然而，随着汉匈战争中汉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其他种种因素，汉武帝通西域的目的则更进而发展成为具有臣服西域，在西域建立统治的企图，最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对西域数度用兵。

不可否认，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①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匈奴传》

汉武帝在西域的政治，军事活动也有不少的进展。但详检史籍，终武帝之世，使用武力的结果，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汉匈两族统治者之间的对抗局面，更没有使匈奴臣服，完成汉匈统一的大业，也没有能够在西域确立起全面的巩固的统治。

先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对匈奴用兵的情况。

依照武帝时期汉匈战争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三三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和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年）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的战争里，汉在军事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赢得了以下几次重要战役的胜利。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汉遣大将卫青出云中，“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夺取了“河南地”。接着，汉于其地设朔方郡，又在故秦九原郡之地设五原郡，并“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①和“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②以实之。从此，河套南北归汉所有。“河南地”原为匈奴右贤王辖地，既为土地肥美、农牧兼宜的经济区域，也是匈奴南下威胁长安的重要依托。因之，汉控制了这一地区，就不仅解除了匈奴南下长安的威胁，使长安以北、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安全有了重要的屏障，也建立了汉北击匈奴的前哨阵地。正因为失去河南地对匈奴十分不利，所以在汉得其地之后，匈奴右贤王还“数寇

① 《汉书·匈奴传》

② 《汉书·武帝本记》

盗边，及入河南”，企图重新夺取其地，结果都未成功。

继得河南地之后，汉又展开了夺取河西走廊的战役。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汉票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两次出陇西击匈奴右地。第一次，汉军出陇西“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靡皋兰下”，杀匈奴折兰王、卢侯王及相国都尉以下共八千九百余人，并“执浑邪王子……收休屠（王）祭天金人”^①。同年夏，汉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复“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②。汉军这两次出击匈奴右地的战果，不仅在于战斗中得到了众多的虏获，更主要的是匈奴右部浑邪王因为汉军所败，恐被单于所诛而杀休屠王并其众以降汉的影响。匈奴右部浑邪、休屠二王所辖的北接沙漠地、南傍祁连山的河西地区，既为汉通西域的天然走廊，也是匈奴联西羌、从西北入汉的必经之路。浑邪王降汉，就使汉顺利地控制了这一重要地带。接着，汉在浑邪王旧地设立武威、酒泉郡，其后又分设为河西四郡。至此，汉不仅打通了通西域的道路，隔绝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也使河西走廊东南的广大地区有了重要的屏障，故自此之后，“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③。

匈奴既失河南，又失河西，于是单于被迫退居漠北。

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遣大将军卫青出定襄，票骑将军霍去病出代，“咸约绝漠击匈奴”，进行第三次重要的战役。卫青与单于战于漠北，进

^① 《汉书·霍去病传》

^{②③} 均见《汉书·匈奴传》

至“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与匈奴左王战于左地，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至此，匈奴单于被迫完全放弃漠南地区，以至“漠南无王庭”；汉从东到西沿边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入侵的威胁。为了巩固西北边境的防御，汉又“自朔方吕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①屯田，建立了一条包含若干屯田据点在内的军事防线。

这一阶段，匈奴不仅失掉河套、河西，被迫退入漠北，实力也遭到严重的损失。据《汉书·匈奴传》记载：

元朔二年，卫青出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

元朔五年，卫青出朔方高阙击匈奴右贤王，得“右贤王人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

元朔六年，卫青再出定襄，“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

元狩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共得“首虏”四万“余级”。

元狩四年，卫青出定襄“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霍去病出代，“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

仅以上举数字计之，匈奴前后共折损之兵力即约近二十万，占其“控弦四十万”总数的一半左右。毫无疑问，匈奴贵族籍以对外掠夺的军事力量是大大削弱了。

进行大规模的战争，难免不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耗。汉虽然在这一阶段的战争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却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如所周知，汉武帝对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民族的一系列用兵，是在文景“盛世”之后，物质财富颇有积聚的情况下

^① 见《·书汉匈奴传》

开始的，但为时不久，国家财政上即出现了“财赂衰耗而不贍”的困境。为了支持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虽然相继实行了“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卖武功爵”、“募豪富人相假贷”、造“皮币”、铸“三铢钱”等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但由于战争本身的消耗以及围绕着战争而来的一系列巨大支出，结果还是“县官大空”和“战士颇不得禄”^①连军队的给养也大成问题。与此同时，在战争当中汉军士马的损失也很严重。仅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出漠北的一次战役，汉军死亡即上万数，汉马死者亦达十余万匹，以致在这次战役以后，“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②。因此，这时在汉内部，一方面由于“兵革数动，民多买复”以逃避兵役，故“征发之士兵益鲜”^③而出现了兵源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军马损失过多而马匹奇缺，马价昂贵，以至官“平牡马”竟高达“匹二十万”^④之数。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时候，经济的条件及资源总是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他们，暴力就不成为力量。”^⑤正是由于财政空虚、兵源不足和战马奇缺等原因，汉在元狩四年出击匈奴之后直到元鼎六年的七八年间，即“久不北击胡”，汉匈战争暂时停止下来。但是，汉武帝并不以既得胜利为满足，在元狩、元鼎、元封之间又先后实行了五铢钱、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盐铁专卖等一系列搜括

①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汉书·武帝本纪》

⑤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176页

财物的措施，并在元鼎六年遣公孙贺出九原、赵破奴出令居击匈奴。由此，汉匈战争转入了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起来，情况却有显著改变，汉在军事上不仅没有取得重大的战果，还遭到了几次惨重的失败。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

太初二年，汉促野侯赵破奴以二万骑出朔方北二千余里。在回军途中受到匈奴八万骑围攻，结果促野侯被俘，其所率之二万骑全军覆没。

天汉二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初虽获得“首虏万余级”，但归途又为匈奴大军所困，以致汉军“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遭到极大的损失。

天汉二年，汉将李陵以五千劲旅出击，亦因遭到匈奴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兵尽粮绝而被迫投降匈奴。

天汉四年，汉将李广利、公孙敖等率步骑共二十万大举击匈奴，结果李广利所率汉军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游击，无所得”，而公孙敖与左贤王战也“不利引归”。

征和二年，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分三路出击匈奴。商丘成一军在浚稽山受到匈奴追击，转战九日始得突出。重合侯一军“无所得失”。作为主力的贰师一军则在速邪乌燕然山为匈奴袭破，主帅李广利投降，七万大军全军覆没。由于这次损失太大，敌终武帝之世，汉均“不复出兵”。

上述事实表明：（1）汉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然而终汉武帝之世，在军事上却并不占有压倒